

中法战争与云南

(在昆明举行的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丁名楠

在中国近代史上,英法两国除联合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外,还单独地发动对华武装进攻,强迫中国开放前门和后门,为外国势力源源不断地侵入中国开辟通道。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逼迫清政府开放沿海口岸,中国的前门由此洞开,独立封建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又被迫开放云南、广西,敞开了中国的后门,法英相继取得中越、中缅边界陆路通商减税等一系列特权,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法国打开中国西南的后门,云南首当其冲,在此后半个世纪里,给云南带来深重的灾难。

“据越困滇”是法国蓄意已久的预谋

英法是18世纪两个最大的殖民强国,在海外各拥有广大领地,它们为夺取海上霸权进行长期、激烈的斗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使法国受到沉重的打击,北美洲的殖民地几乎全部丧失,在印度也遭到相同的厄运。马克思指出,1761年英军攻占法国堡垒本第治里,“彻底消灭了法国在印度统治的任何痕迹”^①。随后的法国大革命,又给了英国“一个极好的机会,使它能够利用大陆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②。经过几场严重的较量,法国失败已成定局,英国确立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法国对斗争的失败是不甘心的,特别海军中的职业军官强烈要求恢复已失去的殖民强国的声誉,力图东山再起。但在两国海上实力极为悬殊的条件下,它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挑选既能为侵略提供借口又不致引起英国公然反对的地区,来实现其扩张的野心。法国终于找到越南作为进行殖民扩张的对象。

1857年,黎峨(Rigault Genouilly)^③以越南迫害天主教徒为名,对越南南部(南圻)发起攻击,强占若干沿海据点。但在当地军民的袭击下,他们胆战心惊,龟缩在据点里,不断地向法国政府告急求援,直到1862年,依靠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得逞的法军,在归国途中镇压了越南的反抗。法国于同年6月与越南政府订立《西贡条约》,割取边和、嘉定、定祥三省,第二年又获得对柬埔寨的保护权,1867年则兼并南圻的西三省,建立起在东南亚的侵略基地。

法国占领南圻的同时,就开始了据越图滇的活动。1864年,一个名叫杜伐尔(Charles Duval)的军士调查北圻红河流域,寻找通滇的道路^④。1866年,在法国海军和殖民部长谢师罗劳伯(Chasseloup-Laubar)策划下,成立了由五名海军军官和一名文职官员组成的湄公河探测队,以侵柬“有功”的拉格莱(Doudart de Lagrée)为队长,西贡殖民政府农工业发展委员会成员海军上尉安邺(Francis Garnier)为副队长。这位部长兼任巴黎地理学会会长,还从会费中拨出25000法郎,资助探测队。湄公河发源于中国,在云南境内称澜沧江。探测队1866年6月自西贡出发,逆流而上,目的之一在证实这条印支最大的河流是否宜于航行,有无可能吸引中国西南地区的丰富物产到西贡来,使它成为同新加坡、上海一样的通商大埠^⑤。这个探测队于次年10月离湄公河到中国的思茅,经普洱到红河(又称元江)边的元江州,然后沿河东行渡元江,经建水、石屏,于12月底抵达昆明后转往会泽。拉格莱因病滞留(不久死于会泽),安邺率部分队员经会理、永胜到大理。折返会泽后,他们从叙州沿长江

东下，经汉口、上海于1866年6月返回西贡，历时两年。安邨在汉口时，会见法国军火商人、冒险家堵布益(Jean Dupuis)。探测队证实湄公河滩多流急，不宜通航，他们虽没有对云南境内的红河全程进行考察，但断定这条河流经北圻入海，是由越通滇的可航水道。西贡法国殖民当局由此重视北圻的红河，放弃湄公河通滇的意图。

堵布益在汉口会见安邨后的第二年，应云南巡抚岑毓英邀请来到昆明。这位冒险家1860年到中国，后来移居汉口从事军火买卖。堵布益向岑毓英建议，聘请外国教练训练清军，使用新式武器，镇压起义回民，还表示开通红河、开发云南矿产的愿望。他离滇后，伴同招募到的两名洋教练重返昆明。1871年堵布益决意探航红河，云南提督马如龙派人护送他到蛮耗，堵布益乘船顺流而下直到北圻的安沛，在保胜、保河分别会见刘永福和黄崇英，要求他们不阻拦红河的航行。他是第一个法国人亲身经历证实红河可从云南通航北圻的。堵布益溯河返回云南，马如龙委他采购军火，许以通航红河的方便。1872年他回巴黎，向法国海军部报告航行红河的经过并代云南当局购买军火的事，得到赞许和支持。1873年，在西贡总督游悲黎(Duperée)的配合下，堵布益组成由两艘炮艇，一艇汽船和一只木船的船队，运载来复枪7000支，炮30门，从海防经保胜转运到蛮耗起岸陆行，于3月26日到昆明，将这批军火交给马如龙，回程中满载锡、铜等金属到北圻。同年，他又企图装载廉价越盐到云南高价出售，越南官员以红河未开放，加以阻止，引起严重冲突，游悲黎派安邨率法军约200人赶往北圻，支援堵布益。安邨不听越南官员的劝阻，凭借武力强占河内。越南政府召刘永福率黑旗军抵御，于1873年12月下旬在河内一举击毙安邨，其余法军逃入河内死守。安邨是极力鼓吹法国对外扩张而臭名昭著的侵略分子。他曾指责法国人目光短浅，只重视欧洲事务，对法国的“伟大”漠不关心，缺乏英国人对外扩张那种坚执的持续的劲头。他认为要避免法国的衰退和扭转盎格魯撒克逊人控制世界的局面，法国人必须成为欧洲的要求和印支利益的仲裁

者，在东亚不再受英国的摆布。安邨主张法国政府要在印度支那“建设性地”善用法国人充沛的精力，不然，这种精力不是白白地浪费掉，就会集注于欧洲的仇杀或者国内的纷争，从而为法国带来危害等等。安邨这一套狂热的鼓煽，在法国产生一定的影响。刘永福黑旗军歼灭安邨后，法国夺取北圻的野心受挫，暂时放松据越图滇的计划。

安邨死后，法国派霍道生(P. Philastre)与越南政府订立条约，规定法军撤离北圻，越南宣布“自主”，红河开放通商。随后双方又签订商约，法国代管越南海关，越南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从西贡运货物往北圻，减半征税等权利。法国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它不久前在普法战争中被击败，割地赔款，元气未复；法王被俘后，法国第三次宣布实行共和，但保皇党人在议会下院占不少席位，极力主张恢复帝制，国内政局不稳。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学者克拉潘指出，在1870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法国在怀疑它自己的政府和共和制度的价值，在怀疑它自己的命运”^①。法国政府内外交困，力不从心，只得暂时收敛对北圻的军事侵略活动。但法国扩张主义者仍不停地发出占领北圻的叫嚣，圣华莲(Saint Vallier)伯爵在议会中煽动，说什么东京(即北圻)拥有许多南圻所没有的资源，土地肥沃的程度不下于南圻，气候清爽，宜于欧洲人工作和居住，有足够的条件使之成为一个繁荣的殖民地^②。1875年法国地理杂志叫嚷，如果法国继续忽视经过东京的有利通道，英国将从缅甸深入到南中国^③。1879年法国海防领事狂叫：“我们必须占有东京……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我们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④1881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法国地理学会议作出结论说：“如果法国希望保留在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它必须同德、英、俄国的扩张保持相同的步伐。”^⑤法国到19世纪80年代，经济已经恢复并得到显著的发展，在政治上共和党人又击败保守势力，在扩张主义舆论推动下，再度上台的温和共和党头目茹费理，顺从金融资产阶级的意旨，挑起侵越战争后，

1883年又把它发展为对中国的战争，逼迫清政府于1885年订立《天津条约》，据越图滇的宿愿从而得以实现。

英法争夺云南的斗争和妥协

法国企图对云南进行扩展的时候，碰到它的劲敌英国的对抗。

云南位于中国西陲，形势冲要，向以矿产丰富著称，历来为侵略者所瞩目。1881年，法国侵越并力图据越图滇时，云贵总督刘长佑奏称：“法国垂涎越南已久……终在必得越南。”“法国志吞全越，既得之后，必请设领事于蒙自等处，以攘金锡之利。”^⑩英国兼并缅甸后，云南巡抚张凯嵩也指出：“英国吞并缅甸，志在滇滇，与法国据越南同一用意。”这两位清朝地方疆吏的论断是正确的，尽管他们不可能预见到后来事态的严重发展。

英法两国对云南各怀野心，英国动手的时间更早。在法国占领南圻前，英国已于1825和1852年发动两次侵缅战争，侵占下缅甸。1858年，参加第一次侵缅战争的退伍军官斯普莱（R. Sprye）就提出从仰光往东北修铁路通云南思茅的计划。1863年又有人倡议自仰光造铁路往中缅边境的八莫，并接着勘测路线。从大理经腾越到缅甸和从昆明经思茅通缅甸、泰国是两条云南主要的对外商道，英国准备造铁路同中国主要商道相连接，其目的在扩大侵略势力是清楚的。在云南回民起义期间，英国把杜文秀控制下的大理一带称为“白旗王国”，地图上的着色也与其他地区不同，显示了企图分裂中国的用心。杜文秀失败后，缅甸英国殖民当局立即组织“探路队”，打算抢在法国之前进入云南。1874年驻北京的英使馆以三四名英官员到云南游历名义向总理衙门索取护照，并派馆员马嘉理到云南迎接。这个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由近2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护送送到中国边境，引起当地人民的怀疑，1875年马嘉理在蛮允被杀，“探路队”受阻退回缅甸。英国利用这次事件大肆讹诈，除勒索其他权利外，还取得从1877年起的五年内，英国选派官员驻扎大理府或云南其他地方“察看通商情形”，表示它侵滇的决

心。法国兼并越南的第二年，英国占领上缅甸，将缅甸全境并入印度，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英国为了在云南同法国处于同等地位，同年与清政府订立的条约中，除要求承认缅甸属英以外，并取得双方派员会勘边界和边界陆路通商的同样权利。随后订立的约章里，又规定开放蛮允（后改腾越）和思茅（已应法国要求开放）以及云南修筑铁路与缅甸铁路相接等等，凡法国得到的权利，英国也要享受，决不让法国一国独占。英法在云南的对立和斗争是它们争夺亚洲乃至全世界斗争的一部分，这使两国关系趋向紧张。

19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加剧。德国的崛起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形势，它企图扩张海上势力，有可能成为英国潜在的劲敌。英国从保护其全球殖民利益出发，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地调整它与列强的关系。缓和同法国的矛盾是它对外政策中着重考虑的一个方面。1896年1月两国作出关于泰国、中国云南和四川以及非洲尼日尔、突尼斯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宣布中国过去许给和将来可能给予英国或法国有关中国云南、四川的商业特权和其他利益，归两国政府及其国民共同享受。两国互相保证尊重泰国的中立，反对第三国对泰国的干涉，宣称在任何情况下，不以任何借口，用武力在泰国取得独占权利和利益^⑪。由于英法达成上述的协议，两国在云南的对立和斗争缓和了。这个联合声明有利于法国对云南的侵略。从20世纪初年开始，法国对云南无论从扩展的速度或者投入的力量，都大大超过英国，使它处于优势地位。

云南是中法战争最大受害者

1885年6月，中法《天津条约》签字。条约规定中法双方派员会勘中越边界、中国边界开放通商、确定边界陆路通商减税的原则。清政府还同意日后中国修建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等等。这个条约为法国势力入侵云南取得合法根据，标志着云南直接遭受法国侵略的开始。

订约后双方首先会勘边界。中国与越南自来山川相连，壤土相接，它们之间有传统

的边界线，但从未标出划定。清政府根据六个月内两国会勘边界的规定，立即任命内阁学士周德润为代表与法国代表到现场勘界。由于当时越南一边到处燃烧起反法斗争的烽火，周德润仅仅与法国狄隆划分从河口到龙腾间一段边界，其余地段的会勘只得留待日后办理。龙腾以西的划界工作到1895年才结束，河口以东到滇桂边境的地段至1897年始告竣事，拖延了十多年之久。

推迟滇越勘界于法国非常有利。它以参加俄德三国干涉还辽有功，硬将建水县属的孟梭、孟蚌等地方划入越境^④，又以所谓的“族类相联”，“辖治相系”^⑤的理由，将1894年英国确认为中国领土猛乌、乌得（现均属老挝）等地划归越南。世界上边界两边居民属同一民族的很多，它根本不能作为划界的充分根据，但在法国多方恫吓下，清政府被迫让步。由于上年中英条约规定，未与英国预先商定，中国不得将江洪地方的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此事发生后，英国指责中国违背条约，引起严重交涉，清政府不得已，又将昔马、科干等地划给缅甸，并将南碗（孟卯）三角地永租与英国^⑥作为“补偿”。清政府在外力压迫下屈服，从而失去云南大片土地。

天津条约规定边界开放通商，云南、广西由陆路进出口货物“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为减”。1887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确定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在两处设立领事馆，并在蛮耗“设蒙自法国领事官属下一员”；由北圻陆路进入云南、广西的货物，减征关税十分之三，从云南、广西出口到北圻的货物，减收关税十分之四。1895年中法又订《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增开思茅通商，并将蛮耗口岸改设河口。加上中国对英开放的腾越（原为蛮允），云南边界通商共有四处。关于边界陆路通商减税的权利，英国也一律享受。中国海关税率原来就定得很低，只值百抽五，半个世纪里没有变动。现在中越、中缅陆路通商，又按原定税率，降低十分之三和十分之四征收，有利于外国倾销货物，掠夺云南物资，使中国蒙受更大的经济损失。

天津条约原规定，中国将来修建铁路

时，向法国经营铁路的厂商商办，法国首先取得在中国建筑铁路的权利。1895年它又掠得特权可从越南已成的或将来修建的铁路接至中国境内。第二年，它为法国费务林公司取得承造镇南关至龙州铁路的权利，以便同越南到镇南关的铁路接轨。1898年，法国又为这个铁路公司获得从龙州延长到南宁、百色的铁路修建权。百色位于广西与云南的边境，法国所以要求把铁路修至百色，通滇是它的目的，但它勒索到广西境内建造铁路的权利后，并没有动工修建，却对建筑滇越铁路表现极大的兴趣。法国政府所以发生这种转变，可能由于云南矿产丰富，对它更有吸引力；而滇越路修成后，能够控制云南对外的交通，广西却水道纵横，密布全省，西江支流在梧州汇合后，东流经广东入海，即使修成越南至龙州、南宁的铁路，也无法对广西全省的交通象滇越路那样，进行有效的控制。1898年，法国提出修建铁路从越南边境到昆明的要求，得到清政府的许可，此后越南殖民当局，不经中国同意，立即擅自派员勘测红河到蒙自以及蒙自至老街和昆明的路线。1901年在法国越南总督杜美的撮合下，东方汇理银行及其他三家法国银行联合组成滇越铁路公司，法国殖民当局补助铁路建筑费1250万法郎。滇越铁路沿线地形复杂，工程艰险。全长465公里，1904年动工兴建，直到1910年才修成通车，历时7年。中国修路工人因受铁路公司虐待、残酷剥削以及过度劳动而丧生的，数以万计。修建滇越铁路，中国除提供土地、民工、木石材料外，铁路的经营管理、客货运价等等，全由滇越铁路公司一手决定，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中法谈判天津条约时，清政府曾拒绝法国在云南、广西开矿和中越边界设厂制造土货等要求。马关条约规定外国可在通商口岸设厂从事制造，法国得以援例享受，自然不需要再提要求，但对夺取开矿权从不死心。1895年《续议商务专条附章》第五款又规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商办”，由此法国取得了在云南开矿的特权。1902年，法英组成隆兴公司，强索云南（昆明）、激江、

临安、开化、楚雄五府，元江直隶州和永北厅的开矿权。凡上述七处曾经开采，后来荒废以及将来公司新探明的金、银、煤、铁、铜、锡、宝石、朱砂等矿，只准公司一家独采；如上述七府、州、厅境内无矿可采，应指定其他州县抵补。隆兴公司掠得矿区之广，矿种之多，都是空前的，引起云南人民的强烈反对，于1910年由清政府支付“赔偿费”150万两赎回，取消隆兴公司在云南的开矿权。

滇越铁路的修建和通车是法国侵略云南产生严重影响的特大事件。从此以后，法国在云南的政治、经济势力迅速膨胀起来。1908年，昆明辟为商埠，随即法、英等国在昆明设领事，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本家接踵而来，在昆明设洋行，在蒙自、开远等处设办事处或分公司，操纵市场和进出口贸易。

1914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蒙自设立支行，1921年又在昆明成立办事处，由越南总行直接派人任经理，这家由法国政府特许设立的海外殖民地银行于1875年在巴黎设总行，1885年又在西贡设远东总行，原以法属印度支那为其业务活动范围，后来扩大到中国及远东各处，成为法国资本对华侵略最大的金融机构。东方汇理银行除办理一般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外，还承汇滇越铁路款项，存储云南盐课、邮政收益，蒙自、腾越、思茅三海关的关余，支持法国资本在云南经营工矿企业，控制云南大锡运销香港所取得的大部分外汇，操纵云南的贸易与金融。它发行的纸币（称为“法纸”或“贡纸”）在云南大量流通。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的分支机构是榨取云南人民脂膏的磨盘。

滇越铁路通车后，它成为云南交通大动脉，改变过去全省进出口货物的流向。从前依靠人力畜力、肩挑马驮，从大理经腾越（现改为腾冲）以及从昆明经思茅出口的货物，大部或部分地转向滇越路，这两条对外商道日益萧条冷落；一向经四川、贵州供国内消费的铜、锡等金属，也部分地由滇越路转运。尽管这条铁路是窄轨，运输能力有限，但毕竟是先进的新式交通工具，旧

式的依靠人畜的运输工具无法同它竞争。这条云南唯一的铁路在一个时期内成为倾销洋货，掠夺云南物资的重要手段，占进口总值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棉纺织品和占出口总值百分之六七十的大锡都由它承运。它是云南人民的吸血管。

进入20世纪，法国侵略云南的步伐加快了。滇越铁路修成通车，法国依靠这条大动脉，把持了云南对外交通，又凭借东方汇理银行这个金融组织，操纵云南的经济和进出口贸易，还通过驻昆明的领事馆，勾结地方军阀官僚，干预云南的政事。法国事实上控制了以昆明为中心的迤东、迤南的云南广大地区。虽然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经过法国几十年的长期刻意经营，是后来逐步造成的，开端却是中法战争，云南是这次战争最大受害者。

- ①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第74页。
-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序》。
- ③ 此人十年后任法国海军和殖民部部长。
- ④ M. Osborne, *River Road to China* (通往中国的水道)，第138页。
- ⑤⑥⑨⑩ J. F. Cady: *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 (东亚法国帝国主义的根株)，第278、281-282、291页。
- ⑦ 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中译本，第260页。
- ⑧⑩ 参见陈辉焯《越南人民抗法斗争六十年史》，第41页。
- ⑫ 罗惇麟：《中法兵事本末》。
- ⑬ J. Mac Murra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马慕瑞(中外约章)卷2，第55页。
- ⑭⑮ 《中法越南交涉档》，第4070、4072—4073页。猛乌、乌得等地系江洪一部分。
- ⑯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编，第687页；华企云：《云南问题》，第20、37页；张凤歧：《云南外交问题》，第68页。
- ⑰ 孔祥祚：《中法战争前后法国侵略云南的罪行》；云南大学历史系等编：《云南冶金史》，第93-94页。